

188



1987.7.29.6
758



五四以来中国 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

丁孝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丁孝智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7
ISBN 7 - 218 - 03709 - 7

I . 五… II . 丁… III . 商业经济 - 经济思想史 - 中国 - 1919 ~ 1992 IV . F729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969 号

责任编辑	陈娟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1.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03709 - 7/F·512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67 83791084



序

丁孝智博士的学位论文完成于 1997 年，现在终于有了出版的机会，可喜可贺。

商业经济思想是整个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 1919 年以前的商业经济思想过去已有一些研究，总的来说情况比较清楚。但是 1919 年以后的商业经济思想则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本书是第一部，作者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

中国的商业产生得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许多大商人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专门为他们立传。有些商人已经注意总结经商经验，著名的如计然（或范蠡）的“积著之理”（经商致富的原理）和白圭的商



人素质论，到今天仍不失其光彩。但是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商业的过分发展会对封建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因此从战国时期起，中国就产生了抑商思想和政策。在抑商思想的影响下，商人文化受到排斥，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思想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司马迁以后，没有一位史学家敢于像他一样在正史中为商人立传了。

民间的商业经济思想受到压制，官方的商业经济思想却一度兴盛。成书于西汉的《管子·轻重》建立了一套官方的商业经济理论，主张由国家经营商业，调节物价，抑制兼并，并从中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中国古代的官营商业的实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平籴（“平粜”）政策。平籴即平价买卖粮食，在粮价上涨过高时政府以较低的价格卖出粮食，在粮价下跌过低时政府以较高的价格买进粮食，以维持粮价在适当的水平。平籴属于“政策性”的商业行为，这种官营商业历来受到人们普遍的肯定。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则要看各时期统治者的重视程度和吏治的好坏。

二、以调节物价、抑制兼并为理由的官营商业。这种官营商业，政府不是经营某一两种商品，而是经营多种商品，以图控制市场和物价。控制的目的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实际上具有强烈的财政动机。这种官营商业虽有丰富的商业经济理论（以《管子》轻重理论为代表），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所以实行和成功率都不高。整个中国古代一共不过实行四次，这四次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西汉的桑弘羊、新朝的王莽，唐朝的刘晏是最成功的，既稳定了物价，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受到史家的赞扬。王安石也是失败者，从变法以后直到中国近代初期，人们对他的变法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只是到清末开始，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才越来越高。改革开放后对它的批评又多起来了。经王安石变法以后，中



国古代再也无人鼓吹这种官营商业了，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明人丘濬就说：“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三、不属于第一、第二两种情况的个别商品的专卖。如中国古代食盐专卖的时间很长，多数时间的食盐专卖并不标榜调节物价。抑制兼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这种专卖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商业经济思想可言。

1840 年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经过鸦片战争，中国被动地对外开放，扩大对外通商。随着对外通商的发展，中国产生了重商思想，商业经济思想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后来又产生了工业化思想，商业作为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也受到经济思想家们的重视。

1919 年以后 70 余年间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跨越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不同的阶段。恰如作者所言，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冲突、交汇和融合下发展起来的。由于政治家或经济学家对这三种经济思想的态度和了解程度有区别，也由于各阶段的政治、经济背景有所不同，各阶段商业经济思想的变化很大。本书对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主要商业经济思想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不同人物的商业经济思想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挖掘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和资料，基本理清了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并初步构建起了商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框架，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商业经济思想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继续演变的方向，而且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改进商业工作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叶世昌于复旦大学
2000 年 7 月



目 录

绪论/1

上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的商业经济思想 (1919 - 1949.10)

第一章 北洋政府统治后期的商业经济思想/29

- 一、北洋政府统治后期商业经济思想发展变化
的社会历史条件/29
- 二、北洋政府统治后期的商业经济思想概论/33
- 三、李大钊：对未来社会主义商业的构划/37
- 四、马寅初：消除外患内忧，保护和发展民族商业/40
- 五、穆藕初：抨击时弊，发展商业/45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 10 年的商业经济 思想/54

- 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各项经济政策与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54
- 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 10 年商业经济思想概论/58
- 三、孔祥熙：官方立场的商业政策主张/62
- 四、董修甲：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及振兴商业主张/66
- 五、唐庆增：倡导研究经济理论，推动中国商业发展/71
- 六、唐庆永：论货币银行与商业发展/75
- 七、徐青甫：“通财主义”商业经营发展论/81
- 八、侯哲彝：消费合作论/87
- 九、陈维藩：重视商业道德建设，谋求民族商业
发展的思想/91

目 录

十、沈志远：对苏联商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及介绍 / 95

第三章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上）/101

- 一、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与商业发展 / 101
- 二、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商业经济思想概论 / 107
- 三、孔祥熙：专卖政策策论 / 112
- 四、伍启元：寻求“社会正义”的物价主张 / 116
- 五、巫宝三：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物价观 / 123
- 六、谷春帆：“物价差别政策”论 / 127
- 七、徐青甫：“物主币从”的物价理论 / 131
- 八、胡沂生：振兴农工产业以发展经济的“重产抑商”论 / 142

第四章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下）/149

-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商业经济论 / 149
- 二、张闻天：坚持保护和发展私营商业的思想 / 153
- 三、薛暮桥：立足于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的商业政策主张 / 159
- 四、王亚南：商业资本危害论 / 164
- 五、千家驹：呼吁改良政治以解决物价问题 / 169
- 六、许涤新：新民主主义内贸外贸关系论及相应的策略主张 / 171



目 录

下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商业经济思想 (1949.10—1992)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 181

- 一、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各项
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 181
-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商业
经济思想概论 / 185
- 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业经济理论的探索 / 191
- 四、刘少奇：论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造资本
主义商业及自由市场问题 / 195
- 五、陈云：寻求发展中国式社会主义商业的努力 / 203
- 六、张锡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发展商业论 / 208
- 七、马寅初：“团团转”理论与商业平衡发展思想 / 213
- 八、赵清心：开放自由市场的主张 / 217
- 九、孙冶方：社会主义产品流通论和生产价格论 / 222
- 十、薛暮桥：对建立社会主义价格机制的探索 / 228
- 十一、李功豪：社会主义工商、农商关系论 / 234
- 十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商业经济思想发展的
挫折时期 / 240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 248

- 一、改革开放后的各项政策措施与社会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 / 248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概论 / 254

目 录

- 三、邓小平：论计划、市场和价格问题/263
- 四、万典武：对商业体制改革的探索和主张/270
- 五、高涤陈：商品流通论及其深化/276
- 六、刘国光：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体制的论述/283
- 七、赵宁禄：商业经营发展论/287
- 八、林文益：论供求规律与市场局势/293
- 九、何建章：搞活商品流通及发展第三产业的主张/297
- 十、张卓元：改革价格体制以发展商业的思想/301
- 十一、陈大鵠：对商业发展问题的全面论述/305
- 十二、赵尔烈：商业整体再造论/314
- 十三、高尚全：市场建设论/319
- 十四、胡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商业思想/326

余论/339

主要参考文献/349

后记/353



绪论

商业经济思想，是人类对自己所从事商业活动的理论抽象和概括。商业活动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初步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缺离的事情。于是，不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思想界对商业活动的探索便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展开，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商业经济思想或理论。

一、对西方几种主要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的考察和分析

在西方，商业经济理论虽在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理想国》等文献中已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真正形成理论体系，且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的，则首推 17 世纪产生的重商主义商业经济思想。

重商主义虽可划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但从其思想倾向来看，都把流通看作创造价值的源泉，将对外贸易看成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其差异主要表现在：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并在贸易上多卖少买或不买。即马克思所称的“货币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认为应允许货币输出，以便扩大对外贸易，但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取得的货币差额，以便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马克思称此为“贸易差额论”，并认为这是“真正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商业经济思想是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产物，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流通领域，特别是对外贸易活动来增加货币资本，从而为正在兴起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提供原始积累。这种试图在流通中实现价值，且把货币混同于财富，把流通视为财富源泉的思想当然明显地存在错误。但是，重商主义者所提出的商业经济理论，却有一些可肯定的内容。譬如它首先在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神学家们轻视商业的观念，为欧洲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开辟了理论和实践的坦途。另外，他们所提出的诸如发展对外贸易、“贸易保护



政策”、“关税保護政策”、减低商品价格和提高商品质量以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地位的思想等，也对任何时期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有着持续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者“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攻击这种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和完全虚构的理论，不承认它是自己的基本原理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1]

1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古典经济学之商业经济理论，堪称西方商业经济思想史上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古典经济学派的商业经济思想改变了重商主义的缺陷，从以流通领域为重点转移到了以生产领域为重点。他们一方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而否定了流通创造价值的重商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流通是生产的继续，是实现价值的必经阶段，从而把商品流通放在了社会再生产环节中一个必经位置上。如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在其著名的《经济表》中第一次试图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他的这一尝试，被马克思高度称赞为“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2]除魁奈外，对商业经济思想做出杰出贡献的古典经济学家还有休莫、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等，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面对商业问题作了论述，提出了足资后人借鉴的思想主张。如休莫在《经济论文集》中提出了著名的“流通货币量增加会使商品的价格上涨”的货币数量说；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论，分工引起交换和交换促进分工论，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论，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论；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成本说，货币流通取决于货币价值论、稳定通货论；萨伊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论等等。所有这些思想和理论，都对人们探求商业经



济活动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从而把商业经济思想推向了“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的研究阶段。^[3]但是，古典经济学派的商业经济思想虽然避免了重商主义的错误，却因它突出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极力向外扩张经济，开拓国外市场的自由化贸易思想倾向，故对许多落后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并非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边际学派虽然在总体理论体系上以主观效用论为指导，把价值说成一种主观的心理范畴，从而使价值变成了一种仅仅是思想意识的表现，而完全失去了任何物质内容。但他们提出了“边际”概念，却为后世所广泛采用。而且，美国边际主义者克拉克还从社会有机体考虑，提出在商业活动中必须重视伦理精神，通过彼此调解协商，在生产中臻进生产者的自由合作，分享利润；而对一些“不可占有的”财货如艺术作品之类，则实行公共使用。克拉克的这一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典学派在这方面的不足，而且将社会伦理价值观念渗入商业行为中，对缔造经济伦理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商业经济思想再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之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商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出来。由于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在总量上失去平衡和结构上失去对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危机频频发生，于是，世界各国经济思想家们转而对现实矛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试图寻求调节社会再生产中所发生的尖锐矛盾。其突出特点是人们开始把探讨的重点放在了微观和宏观的分析研究方面。在微观商业经济思想方面，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提出了“均衡价格论”，巧妙地把以往思想家的“供需决定论”、“边际效用决定论”和“生产费用决定论”等调和为一体。从而正确



地反映了自由经济条件下价格调节供需关系和供需影响价格，使社会产业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在不一致中求得一致，实现了商品供给与商品需求结构上对应的客观过程。在宏观商业经济研究方面，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凯恩斯主义，面对西方屡屡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主张国家应通过财政政策等手段全面调节经济生活，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这一思想主张，无疑为国家对商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40年代以后，西方又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思想。该思想体系是在买方市场形势下对工商企业实践的理论概括。虽然各派别之间有一定差异，但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却可以概括为消费者需求中心论，市场营销组合论和利润导向论。所谓消费者需求中心论是指工商企业根据消费者需求组织生产和流通。所谓市场营销组合论是指企业的自行控制因素——商品、价格、渠道和促销之间保持互相协调的关系，从而使各种经营策略具有配套性，资本流通功能具有整体性。所谓利润导向论是指工商企业的根本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上述三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共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理论体系。其中，利润最大化目标制约着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各种经营因素组合状态，而需求中心论则是在买方市场形势下西方的现代商业经济理论的核心。从古典经济学派的生产中心论发展到现代西方商业经济思想家的需求中心论，这是西方商业经济思想界又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这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它使商品流通活动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十分显要的地位。当然，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价格、市场等均为少数垄断寡头所左右，而且，随着商业资本垄断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当商业与银行、产业垄断结合为三位一体时，商业垄断资本又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



次。同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使其地位从属化。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商业资本的这种新变化，要求理论界对之进行专门的考察和研究，以创立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思想体系。但是，迄今为止，这一任务尚未完成，因此，在吸收和采纳这一理论时，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的商业经济学说及其在苏联的运用和发展

19世纪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商业经济学说，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业经济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吸收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一些合理内容，如劳动价值论等。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相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商业经济学说的理论框架。其中，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和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的理论；关于商品流通中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理论；关于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中商品资本独立化的理论；关于两大生产部门交换的再生产理论；关于价值规律支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关于货币流通的平衡规律和回流规律理论；关于供需关系的理论等等，都使其商业经济学说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一切商业经济理论的特点，从而产生了时代的意义，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商品流通活动的指导思想。但是，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的商业经济学说，本质上讲是建立在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其思想核心在于通过这种分析和研究，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提供思想武器。因此，在他们所设想的社



会主义蓝图中，除了不否认商品、价值的某些性质，如价值决定调节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的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外，^[4]商品生产和交换从根本上讲是要被取消的。而且，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手段，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按照全社会每个成员的需要直接进行生产和分配。显然，马克思这种原本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商业经济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尚未发达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作为指导思想时，尚需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20世纪初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所采用的一系列商业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商业经济理论的折射和反映，但随着经济实践的深入，列宁和斯大林对商业问题的看法也曾出现过多次反复，总的的趋势是越来越承认商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十月革命前，列宁基本的观点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他认为：商品“是由个别的单独的生产者生产的……必须在市场上买卖”的产品。^[5]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须知要组织没有企业参加的大生产，首先就必须消灭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共产主义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像现在这样的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社会”。^[6]不仅要消灭商品，而且货币也要消灭，他说：“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担负某一部分社会所必须的工作，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蓄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外，每个工人就从社会方面领取了相当于他所贡献的一份报酬。”^[7]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理论上继续接受马克思关于社会主



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将要消灭的观点，并常常将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资本主义相提并论。但在实践中却比较注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他在 1917 年 11 月拟定的《经济措施纲领草案》中认为：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的开头几步应当是实行银行国有化、使货币流回国库、发行新货币等等。次年 3 月，又在口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不要货币或者在短期内代之以新的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8]

在 1919 年 1 月到 1921 年 3 月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从总的说来是倾向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并认为在过渡时期应该实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随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政策。1919 年 3 月，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俄共（布）党纲》明确写道：“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单靠银行国有化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烈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建立有钱一定存入银行的制度等等”。^[9]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消灭，价值范畴和价值指标也将被否定，因而，在当时的苏联经济学界曾致力于研究经济生活中无价值、无货币的核算问题。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作法迅速在经济运行中暴露出缺陷和弊端。1921 年，列宁主持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放弃商业只能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陈腐观念，要求消除对商品经济所抱有的一种心理，克服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的心理障碍。他指出：“我们决不能莫名其妙地被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俄国式、半贵族式、宗法式的情绪支